

孔 丘 韩 非 李 袁  
墨 翟 司 马 黄 宗 襄  
老 聃 王 充 顾 炎 武  
孟 轲 范 缜 王 夫 之  
庄 周 司 马 戴 震  
荀 况 王 安 石 戴 自 珍

# 中华民族

## 杰出人物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总 编 李 强

中华民族

杰出人物传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第三集

唐宇元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宁成春  
插图：高民生

##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 第三集

唐宇元主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

787×1092 1/32 13.25印张 230千字

1984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6,000册 定价1.15元

## 编者的话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作出过贡献，得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为了帮助广大青年熟悉和了解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继承和发扬我国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这一套传记读物。本书是其中的第三集。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三集，介绍了孔丘、墨翟、老聃、孟轲、庄周、荀况、韩非、司马迁、王充、范缜、司马光、王安石、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龚自珍的思想和事迹，是一本通俗的人物合传。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唐宇元主编。由汤一介、王恩宇、许抗生、张作耀、张恒寿、张岱年、魏常海、孟祥才、张智彦、郑一奇、石峻、陈克明、步近智、蒋俊、唐宇元、辛智、王守常、蒙登进、楼宇烈撰写（姓名以篇目为序）。

一九八三年八月

## 目 次

孔 丘	汤一介	( 1 )
墨 翟	王思宇	( 27 )
老 聃	许抗生	( 50 )
孟 轲	张作耀	( 73 )
庄 周	张恒寿	( 97 )
荀 况	张岱年、魏常海	( 120 )
韩 非	孟祥才	( 143 )
司马迁	张智彦	( 166 )
王 充	郑一奇	( 191 )
范 缜	石 峻	( 214 )
司马光	陈克明	( 239 )
王安石	步近智	( 261 )
李 贽	蒋 俊	( 283 )
黄宗羲	唐宇元	( 304 )
顾炎武	辛 智	( 325 )
王夫之	王守常	( 352 )
戴 震	蒙登进	( 375 )
龚自珍	楼宇烈	( 396 )

# 孔 丘

汤一介



孔丘,历来习惯把他称为“孔子”,他是我国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几千年来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贤哲。对这样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生平事迹如何?思想如何?他为什么能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历史材料,作客观的介绍和分析。

## 一 孔丘这个人和他的时代

孔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丘前几世就没落了，失掉了贵族的地位，《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丘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几任小官，中年时曾做过三个月的鲁国的司寇，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丘并不象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吹捧、所神化的那样，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孔丘很喜欢音乐，他在齐国听相传是虞舜时的“韶”乐，很长的时间尝不出肉味（《论语·述而》）；他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人家唱得好，一定请再唱一遍，然后他自己又和一遍（《论语·述而》）。他对诗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并多次和他的弟子讨论诗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孔子热心地学习过各种礼仪，“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赞美颜回安于贫困，他说：“颜回真是个贤人呀！一筐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样穷苦的生活所带来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论语·雍也》）他又汲汲于追求富贵，甚至趋炎附势，奔走于权贵之门，国君召唤他，他等不及驾好车马，就赶快跑了去。他喜



欢好吃好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但有时也能把这些看得很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丘说过许多很有道理的话，今天仍可作为格言，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等等；但他也说过许多落后的话，是我们今天必须批判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孔丘对他的学生很严厉，批评起来不讲情面，他批评“宰予昼寝”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论语·公冶长》）；而有时对他的学生也很亲切，他说颜回“我只看到他不断进步，而没见到他停止不前”，当子贡对《诗》的一句话有正确了解，孔子就称赞他说：“子贡呀，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点，你能有所发挥，而推知另一点。”孔丘为人，有时很豪放，他说他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可是有时又很鄙俗，循规蹈矩不敢超越古代的礼仪一步，他走进朝廷的门，那种谨慎的样子，好象自己没有容身之地一般。孔子的学生虽然都对他很尊敬，但他的学生如有意见也敢对他提出批评。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名声不好，有一次孔丘要去见她，子路很不满，逼得孔丘发誓赌咒说：“如果我有什么邪念，老天爷厌弃我吧！”孔子常常和他的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他把几个得意的学生召在一起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愿意让自己的车马衣服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坏了也并不遗憾”；颜回说他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孔子则说他愿意让“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孔子的这番话，常常被后世进步的思想家所引用。

从上面这些事实看来，孔子并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先天的圣人，而是一个有感情、有性格、有抱负、又有世俗心理的现实的人。说到这，我们不能不感谢《论语》这部书，它为我们保存了记录孔子言行较为可信的材料，这部书虽不免有许多吹捧孔子的地方，但它多半记载的是事实，并不是象后来的人为孔子树碑立传那样一味“隐恶扬善”。

《论语》是孔丘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孔子和孔子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分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约二万字。这部书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崔述《洙泗考信录》，是我们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本材料。

孔丘生活在我国的一个社会大变动时代，当时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从孔丘的全部生活和思想看，正反映着这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他是一个从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在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是由于私田肥于公田引起的。公元前五六四年，鲁国开始实行税亩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与公田一律取税。孔丘对这一制度的改变曾表示不赞成，认为这种制度的税额比过去还重，应依“周公之典”行事。这反映了孔丘思想中的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在这一大变动时代，注意到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应该有所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上而下地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把奴隶身分逐渐改变为农奴或农民。孔丘这样的主张就表现在他主张的“仁”里。他提倡行“德政”，反对行“苛

政”，反对对劳动者的非人行为。从这方面看，孔丘的主张在客观上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思想中进步的一面。

孔丘要求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当然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反映了当时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这一阶层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和奴隶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的趋势面前感到非有所变革不可，因此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保守性和进步性的矛盾统一。

孔丘看到，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提高生产；要提高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对生产稍微感些兴趣，所以他说：“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一次孔丘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替他驾车。他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问：“人口众多了，进一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这就是孔丘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他希望劳动者好好劳动生产，这样国家才可以富强起来；国家富强起来，又要对劳动者进行教化，使他们了解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不去作“犯上作乱”的事，这样社会就能安定了。

孔丘政治主张的另一特点，也表现了他所代表的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要求，这就是他对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两面态度：一方面他愿意帮助或者赞成新兴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活动；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某些新兴地主阶级

当权派的“犯上作乱”。在孔丘看来,社会的变化应该是变而不乱。因此从上而下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是可以的;但是由下而上的“犯上作乱”则是必须反对的。孔丘大概意识到,原则上承认“犯上作乱”,不仅不利于奴隶主贵族,它同样不利于封建主阶级自身的利益。因为无论奴隶制也好,封建制也好,都必须维护等级制度。列宁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共有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由于孔丘有这样的矛盾态度,虽然他很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然而他的主张,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是既不能为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所用,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兴地主阶级急剧地变革现实的要求。

## 二 “仁”——孔丘思想的核心

孔丘提出的“仁”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它是“礼”的根本内容,是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础,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视人的世界观的出发点。

在孔子以前没有人把“仁”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概念提出过。孔子提出“仁”的哲学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春秋时代,铁器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的发展,私田不断扩大,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能使对生产完全没有兴趣的奴隶劳动者对生产发生兴趣,不再逃亡,使他们能“近者悦,远者来”

(《论语·子路》),以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呢?也就是说,解决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为适应上述变革要求,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较之以往自然也更尖锐,不是旧贵族势力把新兴的封建势力消灭,就是新兴封建势力把保守的旧贵族势力推翻,或者是两者之间的互相调和,妥协。对于现实生活有着深刻了解的孔丘,是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情况。代表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孔子,他希望能在不打乱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条件下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他在新旧势力之间,就采取调和改良的态度。而对于劳动者,主张改善他们过去在生产中的奴隶地位,对人民行以“德政”,承认某些已经改变了的现实。当时持这种态度的,并不是孔丘一个人,稍早于孔丘的郑国子产就有过这样的思想。

孔子讲到“仁”的地方很多,意思很广泛,从《论语》看几乎是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它包括忠、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孔子的“仁”是他的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他以为离开了“仁”,忠孝信勇等都无意义。那么“仁”的最根本的涵义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

孔丘提出“仁者爱人”,当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而是适应封建主阶级的要求,但它却具有广泛的涵义: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剥削阶级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剥削阶级自身之间关系的问题。照孔子看,有了“爱人”的主观意愿,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自觉地按照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要求“忠”于君主,孝顺父母;作

为统治者来说，对劳动者才能给以恩惠，从而“得众”。但是“爱人”并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他认为只有“君子”才可能有爱人的品德；至于劳动者根本说不上有这种品德，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反映了“仁”的思想的阶级性。

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他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很明显，这些话的意思都是从统治者的主观要求出发，表示对劳动者应有所恩赐，以便达到“民易使”的目的。孔子所说的“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其中“众”和“人”虽不一定都是指劳动者，但包括了劳动者应是无疑的。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有所谓“养民也惠”，“使民也义”等等，“宽”、“惠”、“义”虽是统治者的品德，但“宽”、“惠”、“义”的对象主要是指劳动者也是很清楚的。孔子为什么要把“爱人”也推广到劳动者身上呢？这一点孔子自己就交待得很明白，他说：“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这显然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认为统治者行“仁政”虽然不容易，但收获是会很大的。本来孔子就没有隐藏其“仁者爱人”的阶级性，他把“爱人”推广及于劳动者只是为了让他们安分守己地好好劳动，并不是不要劳动了。孔子认为，对老百姓“宽”、“惠”一些，得到利益的仍然是他那个统治阶级。可见对自己阶级的“爱”，和对其他阶级的所谓“爱”，是有不同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

孔丘强调的“仁者爱人”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原则。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时期，这时旧的奴隶主贵族和新兴的封建主阶级的矛盾自然是十分尖锐的，孔丘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什么态度呢？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行“仁”的方法，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就是他的弟子曾参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意思是主张在统治阶级之间，要推己及人，如果说奴隶主贵族想要站得住，同时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站得住；如果奴隶主贵族希望自己通达，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通达，用这样的方法才可以实现“仁者爱人”的原则。因为照孔子看来，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有“因”有“革”，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面对变革着的现实，从中调和，他认为这是“吾从众”的态度，可以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从另一方面说，新兴封建主阶级也应该这样，“忠”则不应“犯上作乱”，“恕”则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革虽然可以，制度虽也可有所损益，但上下尊卑的原则必须保持，你如果不希望自己被别人从尊贵的地位拉下来，你也就不要去把别人从尊贵的地位拉下来。孔子的这套“为仁之方”看来颇有些矛盾之处，而这种矛盾正是当时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

孔丘的“仁”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涵义，这就是“尚贤”的意思。“尚贤”就是要注重个人的道德、学问和才能，而不管其出身的高低。这个主张在实际上破坏着奴隶主贵族的世官

世禄制度。关于“尚贤”，孔子也讲过许多话，例如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优则仕”等等。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应该有学问，这个看法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打破了世官世禄的贵族政治；另一方面它又能吸收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最终又不能使知识分子摆脱政治的轨道。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路让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羔做费这个地方的县长，孔丘说：“你这是害了别人的孩子！”子路说：“那个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何必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丘批评子路说：“我就讨厌象你这样强嘴利舌的人。”孔丘认为，没有学问没有才能的统治者，那只能是害人的统治者，不能只靠世袭土地和劳动者就可以进行统治，这样的统治是不可靠的。所以当他的学生冉雍问他政治，他说：“先有司（工作带头），赦小过（原谅别人的小过错），举贤才（提拔有道德修养和才能的人）。”（《论语·子路》）有了好的统治者，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人民统治好，国家才能安定。

孔丘认为个人努力也很重要，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他所说的“道”就是“仁”。靠个人的努力可以使“仁”发扬光大；并非靠了“仁”，而自己不去努力，他就可以光大了。这就是说，人是主动的，而“仁”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孔丘很看不惯那些不努力求上进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出息，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论语·子罕》）由于孔丘重视了个人的努力，相对地说降低了“天”的作



用,这也可以说是对西周以来“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因此,他的“仁”不仅是一个政治的道德的范畴,而且是他的哲学范畴,它标志着对人自身的重视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天”的作用的限制。从这一点说,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压低“天”的绝对性和神秘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孟子,孟子在这基础上把个人的主观作用夸大,成为主观唯心主义。

### 三 “礼”——孔丘思想的保守方面

“周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它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如何对待“周礼”,这个问题正表现了孔丘作为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封建主阶级思想家的特性,特别是表现这个阶层的保守性一面。孔丘不仅和旧制度旧思想有着联系,而且他能意识到“礼”作为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对于新起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同样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套等级制度,他们也无法统治下去。

因此,孔丘对春秋末期的“礼坏乐崩”抱着惋惜的态度,把破坏礼的行为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事情。有一次他谈到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的舞乐,本是西周天子用的,而身为天子下面的大夫季氏竟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在孔丘看来当然是“不可忍”的。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鲁哀公,请求哀公出兵讨伐陈恒。“臣弑君”当然是最严重的“犯上作乱”,这种破坏“礼”的行为更是孔丘所不能容忍的